

劇壇姑奶奶張瑞芳

影壇憶往之九

● 潘我源

話劇表演黃金時代

抗日戰爭時期，在大後方重慶，由於條件的關係，電影生產的很少，在印象裡，我只看過一部由舒繡文主演的，忘了是中國電影製片廠，還是中央電影製片廠攝製的影片「血濺櫻花」，其他的國片，都是上海來的，當時以周曼華、呂玉堃、周璇等人主演的影片為多，再有就是美國片了，重慶市也只有「唯一」、「國泰」兩家電影院，許多事都是應運而生，當時在重慶，話劇雖然不是應運而生；至少可以說是應運而發吧。

抗戰時期，話劇在重慶，真是蓬勃發展，當時話劇的四大名旦，白楊、舒繡文、秦怡、張瑞芳倒可以說是在這個形勢下，應運而生的，我那時才十二、三歲，我看過白楊主演的「法西斯細菌」，舒繡文主演的「蛻變」，張瑞芳主演的「芳草天涯」，等等許多話劇，演出這些話劇的劇場「抗建堂」，雖然比起現在的劇場要簡陋得多，但抗建堂在我心目中，是一座莊嚴的藝術殿堂，直到目前為止，我覺得抗戰時期，是我國話劇的黃金時代，勝利以後，電影廠林立，影片大增，後來更是電視深入家庭，話劇也就式微了，話劇演員逐漸轉向銀幕發展。

在張瑞芳演「芳草天涯」，和後來看她主演的影片「松花江上」那個時期，我和她只是演員與觀眾的關係，奇怪的是，我們雖然不相識，但是對她，我有一份親切感，她那純樸的北方大妞的形象，她那樸實的，生活的演技，使我覺得與她之間，沒有什麼距離。

直到一九四九年，我們都在上影廠的演員組，認識了以後，對她那份親切的感覺，仍未有所改變。

張瑞芳各方面的條件都比較優厚，她的社會關係，社會地位，也比許多人優越，在她來說，自覺或不自覺地，難免會產生優越感，但是瑞芳個性豪爽，心直口快，敢於仗義執言，有時候與人爭議起來，一副得理不饒人的樣子，但是由於她的誠摯，並不使人感到她是盛氣凌人，所以大家善意地，概括地給了她一個「姑奶奶」的綽號。

記得一九四八年，在上海斜土路電影廠地拍攝「群魔亂舞」這部影片，戲中演員有石羽、上官雲珠、章曼蘋、夏天，我因夏天的關係，也在片中客串了幾個鏡頭，有一天，金山和張瑞芳來到了片廠，我

才聽說「群」片是清華公司拍的，而清華公司的老板就是金山，那個時候張瑞芳是他的太太，第二年上半年影廠就成立了，張瑞芳在上影演員組，但是沒有看到金山，只聽說金山在北京，沒有多久就傳出他們婚變的消息，他們離婚不久，很快就傳出瑞芳再婚的消息，對方是老解放區來的演員嚴勵，真可以形容他們是「閃電式的結婚」，同時他們沒有延用我以前提到我們組同事結婚的形式，發幾粒糖，跳跳舞，大家歡聚在一起，慶賀一番，而是請了婚假，二人出外渡蜜月去了，因此讓我印象深刻，當時張瑞芳可以說是名聞遐邇，而嚴勵卻是名不見經傳，他們倆個為什麼會結合，如今四十多年過去了，似乎見到了答案，四十年來，他們倆人共同經歷了各種政治運動的風風雨雨，兩個人互相愛護，互相扶持，兩人之間，從未傳出任何不和與排間，嚴勵老成持重，待人誠懇，為人厚道，我想大概最讓瑞芳感動與珍惜的，就是他給瑞芳的是一份完整的愛。

非常時期缺乏宣傳

我是一九五二年，調到翻譯片剪接組的，就在這前後不久，嚴勵也調到美術電

影製片廠，做廠長去了，在萬航渡路（早先稱極司斐爾路）上，有座花園洋房（聽說過去是錢大鈞的官邸），隔壁還有一座花園小洋房，過去是外國人住的，那時候也空著，這兩座房子打通了，又是違建，又是改建，劃分一下，就成了美術電影製片廠和翻譯電影製片廠的廠址，兩個廠在一個大門裡，所以我倒是常常和嚴勵見面，他臉上總是帶著溫和的笑容，對我來說，他像個兄長一樣。

因為有張照片留下來，我才想起還在演員組的時候，我和嚴勵、史原、柳杰在一起演出過，在那裡我已經忘了，從照片上看，好似宣傳隊的性質，我們在唱歌，指揮的就是嚴勵，想起過去的演出，真令我汗顏，我是半路出家，沒有受過專業訓練，又沒有什麼才藝，就這種情況進了演藝圈，話劇、唱歌、朗誦、變魔術，甚至打洋琴，我全都上過，這就初生之犢不畏虎，我對樂器本是一竅不通，有一次排快板劇，樂隊中缺洋琴手，叫我現學現上，我就天天練習手勢，還練一五六一五這五個音，到了正式演出，因為過門稍長一些，我就手忙腳亂了，我只好做做樣子，不碰到琴弦，讓別的樂器掩蓋過去，然後我

就打一五六一五這五個音，煞有介事，好像我有多麼的熟練，其實真是濫竽充數。

回憶有時也靠翻翻舊時的照片，說起照片，現在的人一定會認為，這有什麼稀奇，可是當年，我們每張照片都得不來不易，剛解放時，還有記者在我們演出活動時，為我們拍照，大約不到一年，這個情形就不存在了，記者在我們面前幾乎絕跡了，我們有照相機的人不多，即使有照相機，膠卷也不易買到，有時廠裡會賣出一些底片給大家（拍戲剩下的零頭片），也不是經常有的，所以那時候想自由地拍拍生活照，並不是那麼方便和容易，再加上文化大革命中，紅衛兵以掃四舊為名，任意闖入民宅抄家，什麼書信、照片、字畫、書籍、旗袍、高跟鞋等等，抄到什麼都給你燒了、毀了，我還算幸運的，沒有把我的照片全燒光，還留下了一部分，否則，那些歲月，我只能憑腦海中的印象來回憶了，像和嚴勵的這張照片，如果沒留下來的話，那麼，那次演出的事也不會記得了，這張照片後面蓋著「大報」的印章，說明當時是「大報」的記者，給我的這張照片，可是我連大報也不記得了，因為解放後沒

有多久，上海就只有兩份報紙，一份「解放日報」，一份「文匯報」，早年還有一份小報「新民晚報」，不知在那年「新民晚報」也沒有了，在我的印象裡，報紙上沒有娛樂版，只有電影廣告，如果報導藝術團體的消息，也是以政治的觀點來報導的，比如某某藝術團體出國作訪問演出，或者是某某國家的藝術團體來我國作訪問演出等等，這些都是以促進文化交流的作用來報導的，至於某個藝人如何如何是不報導的，決不會突出個人，任何行業的從業員都是國家幹部，大家只是分工不同，電影從業人員，不論演員、導演、攝影、錄音、美工、剪接等等，都是文藝幹部。

敬業負責平易近人

雖然缺少宣傳，影片本身就是最好的宣傳，片子上演以後，觀眾自然會認識和記住演員，尤其是戲演得多，又演得好的主要演員，張瑞芳就是這樣的演員，在影片「李雙雙」中，她把一個農村婦女李雙雙，塑造活了，以致後來提到張瑞芳，就會連想起李雙雙，提到李雙雙，一定會誇張瑞芳的演技，瑞芳是一個敬業樂業的人

，對待工作認真負責，一絲不苟，她的成功，是靠她腳踏實地，不斷努力得來的。

張瑞芳原來住在高安路上的西湖公寓。大約在一九六二年的時候，我有天下班回家，孩子們高興的對我說，媽媽，今天好開心啊！嚴勵叔叔和瑞芳阿姨，請我們大吃了一頓，我問為什麼，原來是瑞芳搬家，搬到我們附近的淮中大樓了，夏天帶著兩個兒子去幫忙，搬好以後，瑞芳請他們父子在「天鵝閣」吃了一頓西餐，想到這兒，我又有些事想說一說，現在的人一定會想，吃頓飯還值得去寫嗎？那就要看是什麼時候了，我們那個時候，正值三年自然災害，很長一個時期，多數人處在半飢餓的狀態下，那個時候，我們只能買到兩種蔬菜，一種是卷心菜，不知是肥料不夠，還是時間不夠，這種卷心菜根本卷不起來，每棵菜只有幾片張開的綠葉子，所以大家給這種菜取了個名字，叫「光菜花」，另一種菜是胡蘿蔔，但細的只有小指頭那麼粗，不僅如此，我們一切都是限量的，我們的糧食，平均每人每月廿五斤，油每人每月半斤，肉分上中下旬三張票，每張票可買兩毛錢的肉，豆製品（包括豆腐、豆干、千張、豆芽菜、麵筋等等。）

亦分上中下旬三張票，每張票只能買四分錢的豆製品，糕點票每月每人三張，每張票買一塊糕點（桃酥、蛋糕之類的點心），煙要煙票（是每戶一份，各種牌子搭配的十包煙，一次購完），糖要糖票（白砂糖，每人半斤）、布票（每人每年一丈五尺，有一陣買毛巾也要收布票），肥皂票（洗衣皂，每人一塊，我們家五口人，我記得每個月有兩條半肥皂可用），生活必需品樣樣要票，就是要有錢，沒有票也買不成，在各種食品都受到限制的情況下，人的飢餓感，越來越強烈，肚子好似永遠填不飽，在那種情況下，能美食一餐，又是飽餐一頓，高興的心情，確實非比尋常，如今吃的再多、再好，也不會放在心上，但是那次吃「天鵝閣」開心的感覺，恐怕永遠也不會忘卻。

文化大革命中，我們因不同的問題，都受到了衝擊，而且在一九七六年，我們翻譯片廠，由萬航渡路遷到了永嘉路，與美術電影製片廠分家了，於是與嚴勵和瑞芳就都很少見面了，這裡想提及的是，在文革中，電影局所屬的各單位（故事片廠、科教片廠、美影廠、上影樂團、技術供應廠等等）幾乎全停擺了，人員都下放到

奉賢五七幹校勞動與學習去了，唯有翻譯片廠，一枝獨秀，文革十年來，工作一直沒有間斷過，還建造了新廠房，我們在萬航渡路老廠的錄音棚，十分老舊，常因收到雜音而NG，都管它叫漏音棚，沒有冷氣設備，天熱起來只能用大塊的機製冰來降溫，我們在永嘉路上的新廠房，是在文革中施工的（原址是蘇僑協會），有現代化的錄音棚，除了保留原有的一幢洋房，做為辦公及演員休息室外，還建了一座技術大樓、大放映間和幾個對口型用的小型放映間，所有建築內，都有冷暖氣設備，為什麼翻譯片廠有此特殊的待遇，因為江青除了抓八個京劇樣板戲以外，她也親手抓上影譯製廠，直接下達任務，要我們廠為她譯製許多影片，為我們興建新廠，是為了提高質量，那個時期所譯製的影片，都叫做內部參考片（不對外上演），並且不准譯片名，而是以數字做代號，如一號片、二號片，以此類推，而且影片要極端保密，一號片的工作人員不能觀看二號片，二號片的工作人員當然也不允許觀看一號片，行政、事務人員，一律不准觀看影片，據說這是中央指示，大家都得嚴格遵守紀律，一時間翻譯片廠成了保密廠了，

（直到四人幫倒台，才結束了這一情況）這個所謂中央，看來就是江青，但是這麼做到底有什麼意義，說真的，直到現在我也不明白。

勤練氣功十年有成

我離開上海十幾年了，去年我又回去了一趟，特別想去看瑞芳和嚴勵，因為在回去不久前，在第四台看到介紹她和嚴勵的紀錄片，還有介紹吳茵（吳茵當時已不在世了）、王丹鳳、孫道臨、王文娟等名演員的家居生活紀錄片，他們都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了。前幾年在香港和王丹鳳見到一面，回上海和孫道臨、王文娟也見過好幾次了，唯有瑞芳多年不見了，真的蠻想她的，那天我按了門鈴以後，像躲貓貓似的，縮著頭，哈著腰，等門一開，我一面叫著瑞芳，一頭就扎進屋裡去了，因為事先和瑞芳約好，我要去看看她，所以對我的到來，她並不感到意外，她笑著說，喲！小潘，你怎麼像是昨天才走，今天就回來了，一點都沒變，只是你怎麼好像矮了一截，我說，我這一走已經十八年了，時間過的真快啊！我是縮了好幾公分，看著她，我感到十分欣慰，我又對她說，

瑞芳，你變得比我走的時候好了，而且好多了。記得一九七九年，我離開上海時，瑞芳給我留下的印象是，頭髮花白，面龐虛浮，精神也不濟，文革中傷了的元氣，尚未恢復過來，可是事隔多年，這次再見她，她雖然仍未染髮，但氣色很好，精神奕奕，毫無老態，顯得比那時候還年輕，我覺得奇怪，把我的感覺告訴她，問她為什麼會這樣，她說她練了十幾年氣功了，看來還真是有效，她還教了我幾個基本動作，我沒有恆心堅持下去，我那天去，嚴勵因身體不適而住院了，很遺憾沒有見到他，瑞芳正在寫自傳，準備出書，她答應寫好了給我一本，還提到藍為潔常在報上發表文章，她並鼓勵我也寫點東西，我告訴她就是為介紹藍為潔的文章，我也寫起東西來了，我並且還要寫篇關於她的回憶，我還說等她的書寫好了，我可以多一些資料，可這一等就是一年多，也不知道她的書出版了沒有，我也不等了，就憑過去我與她的交往，我對她的記憶，寫出這篇回憶。

當年的四大名旦中，張瑞芳是最幸運的，如果說，人是有命運的話，那麼張瑞芳是屬於好命的。